

历尽坎坷 梦想依然

——九旬诗人马作楫和他的中国梦

□珍 尔

马作楫老师将他九秩之年的新书起名为《梦想依然》。在物欲横流、信仰缺失、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还有多少人愿意审视自己的内心,为形而上的精神留方寸之地?有的人年轻时就失去了追求和梦想,感到生活的天空如此灰暗和无趣,于是,灵魂失却了安居之所;有的人甚至将生命像扔掉一块抹布一样轻抛。而诗人马作楫,却在历经世纪的沧桑之后,依然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大地上,执著地追寻着梦想的美好身影,保持着对生命的和生活的慈心和爱意!

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写诗至今,马老师将70多年的心血都倾注给了缪斯女神。有人说,诗歌属于青年,小说属于中年,散文属于老年。许多文学青年在文学梦的萌芽期,都曾有过写诗的经历,但真正能够一辈子都爱诗、坚持写诗到老的人并不多。而马老师,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难得可贵的一位。

忧郁:只因爱得深沉

“这日子/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没有自由/没有干粮//这日子/春天不会来/蜜蜂不能唱//于是/这日子/就像患上了/沉重的瘟疫病。”(马作楫诗歌《这日子》)四个急促的排比句,形象地揭示出上世纪40年代日寇占领下的被奴役者的生存状态。读着这首诗,我们恍然看见一位眉头紧锁、心情沉重的青年,正穿过战火硝烟,背负着平民百姓的痛苦,向我们走来。他的眼里含着泪,诗歌,就是他为抗战呐喊、为人民呼号的武器。

“当流弹/打穿了/人民号泣的胸膛/我也开始流泪/在这战争中的北方”,年仅20岁的诗人,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有一次回故乡的时候,因为不肯给日本人鞠躬,曾遭到呵斥。他深深感受到做亡国奴的屈辱,他的眼泪和人民流在一起。“我的歌/是连血脉带的/仿佛我的诗潮/也滚烫着我赤子的心胸/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被我所感觉到的/也是众生感到的苦痛”(《春神与诗人》)。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最可贵的品质,有着良知、道义、责任感。他从一开始写诗,就应和着时代的节拍,在为百姓立言。目睹当时旧中国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黑暗现状,诗人用手中的笔,表达着百姓的哀伤和苦闷,与源远流长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与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何其相似,显示出他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高洁品格、广博胸襟。

以诗集《忧郁》为代表,马作楫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时期的诗歌,在他本人的诗歌创作中是一个里程碑。诗人文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我爱这土地》)这句话用在马作楫老师身上同样适用。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他不平则鸣,他是在为百姓的疾苦而忧郁,为民族的前途而焦虑,这一切都是因为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爱得深沉。

经历:锻造爱的财富

在抗日烽烟中,一批打赤脚穿草鞋的少年经长途跋涉来到甘肃天水的玉泉观。这批少年中,就有诗人马作楫和牛汉。在松柏葱郁的古庙里,黑板挂到树枝上,老师就开始讲课,膝上放一块小木板就是课桌。山河破碎的惨痛、抗战鼓声的激励和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激起了青年诗人的乡愁和灵感,作文课上,马作楫写下了一首七绝《夜思》:“更声落落一声鸡,夜色朦胧月向西。凄冷客床当岁暮,故乡万里思征。”

在这一时期,马作楫和牛汉等一批喜欢新诗创作的同学常聚在一起,互读诗稿,神聊写诗心得。牛汉在晚年的来

信中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生的诗创作经历与人生的甘苦,我与作楫几乎是同时写起的。我最多早一年。他一开始就显示出了个性,比我宁静、细腻,也比我忧郁一些。”(转引自牛汉给马作楫的信)可惜的是,1942年,马作楫因家事请假回乡,以后再没能回到天水国立五中,但他是多么怀念那些与诗结缘的美好时光!

1946年凭借一首诗作考入山西大学后,马作楫的心情和环境都焕然一新。在这里,他结识了王文光、杜任之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知名教授,师生们常聚在一起切磋诗艺,朗诵诗歌,演唱进步歌曲。他还和当时在经济系教书的著名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李毓珍(余振)共同办起了以反内战、争民主为宗旨的民盟地下刊物《北风》诗刊。李毓珍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个小刊物花力气最大的是马作楫,不但是主要撰稿人,而且编排、校对、发行等工作都由他一个人包下来。”该刊以宣传民主进步的诗作、诗评和短论为主,在当时影响很大,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不满。阎锡山特务头子梁化之正面警报,在险恶的政治环境压力下,《北风》诗刊在出了7期后被迫停办。马作楫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山西大学民主同盟秘密支部办的地下刊物,但年轻的诗人爱国进步的思想倾向显然与这个刊物极其合拍,诗人的创作激情被点燃了。应和着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浪潮,这一时期,他的诗从笔下源源流淌,诗歌创作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除了发表在《北风》诗刊的著名的诗篇《预言》《春神与诗人》《我走出了村庄》等诗外,诗人还写下了《野店》《河流》《流浪人》《歌》《油灯》《雨声渐沥》《飞鸟篇》《凝噎》《远行》《在夜里》等一系列新诗。同年,在李毓珍的推荐下,他的第一本诗集《忧郁》在上海光华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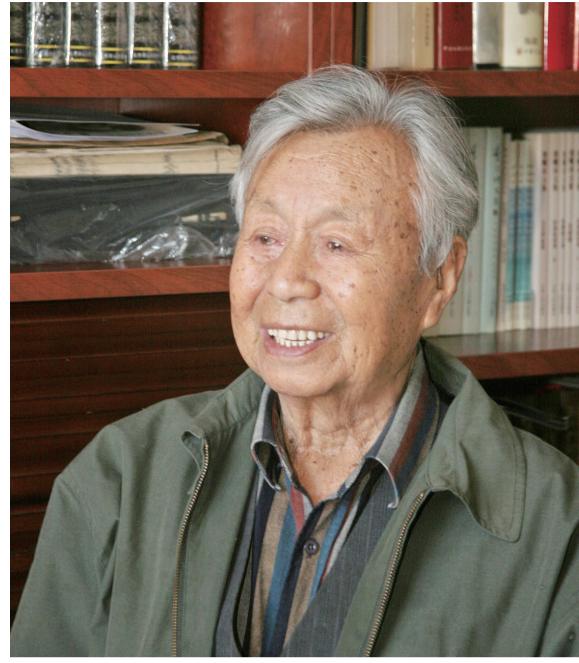
故乡:心为爱而燃烧

大学毕业后,马作楫留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他勤勉教书,同时还坚持诗歌创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诗风一改过去的忧郁苦闷,写了许多讴歌故乡、歌唱新生活的诗歌,如《古城的旅行》《油灯》《乡居》《我走出了村庄》《双塔》《汾水谣》等。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写于解放初的那首《太原》,已成为描绘并州的经典诗篇:“啊,太原,你装满钢铁的船/双塔像你耸天的桅杆/东山西为你叠成船舷/漫天红霞与白云戏成彩色的帆//我日夜倾听汾水的欢唱/疑是你的手指弹响欢乐的乐章/看黄尘滚滚是你溅起的浪花/啊,太原,你载着人们向幸福启航。”这首诗巧妙地将太原比作一条装满了钢铁的船,十分切合太原这个以炼钢为主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形象,美丽高耸的双塔本来就是太原的标志,将其比作船上的桅杆更是令人拍案叫绝;而汾水、黄尘、浪花等諸多意象的运用与比喻,则非常贴切、形象,构成了一幅完整美丽的画面,令人不得不叹服诗人妙笔生花的构思之巧!

长期的执教生涯中,他一直保持了对学生和教育事业的热爱,写出了许多纯情的校园诗,故有“校园诗人”之誉。一个人,能长期浸润在世俗烟尘中却未被污染,保持着心地的纯净,这缘于他稳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熟悉马老的人都知道,他乐善好施,助贫济困是出了名的。

马老师教书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不乏当官掌权的,上至省级领导,下到基层官员,但凡马老师张个口,让学生给老师办点事并不难。但马老师却从不因自己的私事给学生添麻烦,惟一一次破例求人,却是为一个司机师傅的聋哑女儿找工作;而自己,就连印诗集的经费都婉拒学生的资助,非要自掏腰包。

上世纪90年代,山西大学人事处动员马老师填表申



请国务院特殊津贴。马老师却说:“连常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人都没申请,我不够格。”他果真一直没有申请。以他的身份、影响与资格,如果申报,评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先生面对名利的这种谦逊和淡泊,真不知让多少腐败分子和追名逐利者汗颜!

从山西大学中文系走出去的一茬又一茬学生,都经常记挂着马先生,过年过节都会回来看他。对那些从政的弟子们,马先生常爱叮咛的几句话是:“老实做人,诚实做事,清白做官。”“做官先做人,做人先正身。”

作为一个有名望和地位的教授,马老师的爱心还体现在平民意识上。对学校的工友、司机、炊事员等他都尊重有加。在他当中文系第一副主任时,连续四五年负责组织高考阅卷工作。当时气候酷热难耐,500多名教师集中在同一个礼堂中阅卷,大家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工作十分辛苦。为了让炊事班的师傅将饭菜做好,一次在开大会的时候,马老师特意将厨师代表请上主席台就座,并代表大家亲自举扇为他们扇凉,表示尊重和感谢,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几位师傅也热泪盈眶。在他的带领和协调下,大家心情愉快,阅卷工作从未出过纰漏,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

过春节的时候,他不请高官吃饭,不给有钱人拜年,却总是记得将帮助过自己的炊事员、司机、普通教师、甚至传达室的工友都约到饭店,自掏腰包请他们吃饭。逢年过节,他记挂的是传达室的工友,端午时给他们送粽子,中秋时不忘送月饼……他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孤傲,是一个人缘和口碑极好的平民教授。

“呕心沥血育桃李,高歌低吟颂神州。”作家马烽给他的题词正是马老师的真实写照。马老师的人格高度,其实就是爱的高度。做诗先做人。真正的诗人,首先要有爱的高度,人格的高度,他的诗品才会高洁芬芳。这就是三晋诗坛泰斗马作楫先生给我们的可贵启示。在与恩师马作楫交往的近40岁月中,我在执弟子礼的同时,常常会感觉他既是尊师,又像慈父,他以自己的诗篇和点滴言行,身教重于言教地为我们树立着人生的标杆。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不管在生活中受到多少误解与委屈,马老师都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总是在默默的负重中奋力前行,以点点滴滴的坚韧,获得了世人的敬慕。

今天,在他93岁高龄之际,这本《梦想依然——马作楫书信诗文选》问世了。这本书留给文坛的,不仅仅是珍贵的书信和史料,同时也是一位世纪老人充满了风雨坎坷的脚印。联想到大街上那“中国梦”的卡通画,想到诗人马作楫从青年时期就盼望着中华民族强盛的赤子之心,虽历尽坎坷却青春永驻,仍曰“梦想依然”,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别这个话题。

在欧洲,新的城乡差别基本形成。不过,这个差别是倒过来的:近90%的乡里人不愿意离开乡村,而50%多的城市人希望住到乡村去。

现在欧洲乡村的标准是生态化。

乡村分生产区与生活区,生活区也像城市一样叫社区,而且比城市的社区更具特色。

乡村社区的交通、供电、供暖、供气、给排水系统、垃圾处理系统等均由市政当局负责。

在我们搞农村硬化的時候,欧洲国家居民门前原先冷冰冰、硬邦邦的水泥路面,已被草坪、碎石沙土小径和木质的篱笆取代,蔓草湮路,天然野趣。

如今,欧洲农村社区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国际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把欧洲农村社区的模式移植到城市社区的建设之中。

“乡镇书记”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扳着指头算民生账、经济账,盘算着拓宽可持续发展的路子,而且几次忍不住用“作者认为”的口吻站出来说话——

乡村的生产区一派现代化和生态化,这里给城市提供了充足的肉、蛋、奶、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和发展轻工业的优质原料,农民也因此获得更丰厚的收入。而且,农民还可以享受国家向农业倾斜的许多优惠政策。

作者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应该从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探讨和用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途径来解决。

譬如……

但所有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归宿,而是体制性的城乡两种户籍、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也就是说,人为的痕迹很深。

实话实说,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抛开什么“情怀”且不说,仅是这些书写于七八年前的剖析见解,即不乏超前意识和深刻见地。正是这些关注中国现实、关心民瘼的文字,才拓宽了游记散文仅限于抒写花花草草的题材范围,形成了独特的文体;才使得这部书显得厚重而且凝重;才展示出了它的价值与分量。

2014年6月,贾宏图先生来电话,他的声音带着北方的风。我建议他把几年前出版的两本《我们的故事》重新精选成一本,既可以节省阅读的时间成本,又能低价面世,让广大读者特别是老知青们方便分享。我说,“趁着现在精力还行,再为老知青做点事多好。”

“好!”宏图先生一口答应。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他的精选稿,他从《我们的故事》中精选了50篇,又做了一些补充。《我们的故事》两本书700多页,120多个知青人物故事。宏图收集采写的这些知青故事,是他数十年的心血,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成书,便一气呵成。那时,人们一窝蜂地为商人写作,宏图先生却不计名利执著于为已经解甲归田的老知青写作。这些文字虽不是“披阅十载”、“字字看来皆是血”,却是带着他的体温和心跳,是被作家梁晓声称为“第一等的情怀”之作。

在那个微雨的午后,我怀着一种期待阅读,那些滚烫的文字,让我又一次看见了他永不退休的激情与思考。我与宏图先生三度合作,每次阅读都唤起我“连自己也烧在里面”(鲁迅语)的激情。《我们的故事》是我在2008年编辑出版的,那一年在上海美术馆签售时,那里正逢陈丹青、李斌、潘衡生、刘孔喜等老知青们的画展。那天,仿佛是“我们”的一次盛大聚会,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来的知青们,都已是两鬓苍苍,可眼睛里还存有一丝那个远逝年代的光辉。知青们围着宏图,签售的队伍一直排到二楼,有些老知青还拉着宏图讲自己的故事,那时我感到“我们的故事”还要讲下去。果然,时隔一年,我们又出版了《我们的故事》续集。

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知青问题,我编辑了一些知青作家的书。每读这些文字,常常热泪奔涌,我看到了千百万知青还在,心未死。我们把这本新作定名《青春1968》,因为1968已经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代名词。那一年2000万知青奔赴农村,那场山上下乡运动一直持续到1977年。“文革”十年,整个中国教育停顿,有的地区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这是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灾难。

贾宏图就是1968年的知青,他下乡到黑龙江省建设兵团。在下乡前后,他和知青们一样接触到现实,亲眼看见了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识被愚昧扼杀,民主被彻底坐牢,眼看着青春、理想、人生抱负都付诸东流,知青们渐渐觉醒。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请愿成为最大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督促中央“认清”不发展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后果,从而推动中央“工作重心的转移”。所以,知识青年又成了结束“文革”的主力军,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先遣部队。

所以,不说1968,就说不清楚新中国历史,甚至说不清楚中国的改革开放。

宏图先生是最早开始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知青命运的作家之一,他似乎通过写作探寻着自己的精神血缘。他在对一个个知青案例的采访、写作中“反思和审视自己”,他非常坦荡地解剖自己——“由于当年的愚昧无知、狂妄自大、胆怯懦弱、自私和利己,使自己和别人的命运雪上加霜。也许上帝都会原谅我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毫不回避地记录下来,那可能是我们的后代最为珍贵的人生宝鉴。”宏图的反思,说出的是一代知青这辈子要说的心里话。

有一个知青叫金学和,他能诗文善歌舞爱人,还在窗台上试验早熟的小麦品种,他是知青们的精神领袖。在一次搬运木头时,他为救战友被原木砸死,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但那是“一次人为的事件”,宏图自此开始反思:“他的死是否值得?”

那个年代,中国的教育就是“革命”、“斗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迹都号召人们奉献、牺牲。所以,当公社号召去大江里捞木头,上海知识青年金训华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队的羊群落水了,又有天津女知青张勇为救羊而牺牲。木头、羊群和人,孰轻孰重,在今天连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而在那个年代,人们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宏图先生是个非常敏锐也非常有分寸的人,这和他多年从政并在新闻岗位工作有关。他出任过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省文化厅厅长、《黑龙江日报》社社长,也许有些话他并没有说,但是只要沿着他的追问稍一思考我们就会明白,那些年轻的生命,无论死的光荣还是死得其所,对个人和家庭来说都是最大的悲剧,因为人生只有一次。一个社会需要有见义勇为、甘于奉献,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贾宏图的分寸就在这里,他绝不会说:先定契约,后谈奉献,不定契约就不奉陪。他只能一次次扪心自问——

我们时代造就了许多这样的英雄,英雄舍己救人的事迹不容置疑,但造成英雄的条件是值得反思的。这些年,因为事故不断涌现英雄,一些人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他就微不足道了。这是更大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还让它演下去吗?……

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

《青春1968》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人与事。1968浓缩了一个时代的青春、热血、盲从和莫名的仇恨,它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长长的阴影。当年被骗了青春和命运,而今又看见那些鼓吹别人奉献自己贪污腐败的人,老知青们不禁要问:我们献了青春献终身,奉献了终身献子孙,可换来的是什么?我们还要为明天付出多少代价?人们在愤怒之余便是躁动不安,因为失去了安全感。所以我们就看见,地铁门刚一打开,上面的人还没下来,下面的人就往上拥;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的路上,常有追尾;只要是排队,就有人加塞儿,破坏规则……人与人充满着戒备、猜疑,甚至仇恨。

对于那段知青历史,宏图非常清醒,这一代人眨眼就会过去,身体在衰退,思想能力与写作冲动都在减弱,如果不抓紧抢救第一手资料,那就真正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历史,也对不起自己失去的青春。所以他一直坚持写知青的故事,探索这一段中国历史,《青春1968》,是对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抢救。

在《青春1968》中,我们能感受到宏图的一种努力、一种抵抗,抵抗生命的自然进程。这种抵抗与不屈依然保留着1968的影子,这代人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主义,至今依然像当年一样满腔热血、不甘心沉沦,哪怕熬干最后一滴血,也要用生命的余晖发出最后的声音——独立表达自己的历史,传承中国知青记忆。

现在,我又一次编辑知青的故事,那些年轻的容颜不断地在案头浮现,他们让我一次又一次想到自己多么幸运!宏图先生笔下的知识青年牺牲的时候,我还在哈尔滨读小学。或许当年我吃的馒头,就是他们种的麦子。我多么幸运!我是1975年下乡的小知青,1977年就通过刚刚恢复的高考重返城市。我也救过山火,也差点被机器绞死,但是我活着回来了。

回来了,我最想说的就是:热爱生命,热爱这个世界。比起那些逝去的生命,所有活着回来的知青都是幸运的。翻开宏图带给我们的故事,你心里升起的是满足,是珍惜,是爱。我想,这也是宏图最后的表达。

宏图先生历尽沧桑,不论在哪里,他从未放弃对知青历史的追问。他依然在不断地采写知青、回访知青、救助知青和知青的遗孤。过去如此,未来也将如此,这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年轻时候在北大荒种麦子一样,他现在依然每日耕耘,为我们播种精神的麦子。

——《青春1968》编者的话
□萌娘

《毛诗序》有言:“是以一国之事,系一